

最譯著名學文界世

著 爾 達 丹 斯
譯 震 瑞 趙

L'ABBESSE DE CASTRO

持主女的樂德思嘉

法國文學名著叢書

第一輯
第一卷

L'ABBESSE DE CASTA

杜拉伯樂德思嘉

世界文學名著譯叢

L'abbesse de Castro

by

(*de* Stendhal)

嘉思德樂的女主持

著 爾 達 丹 斯

譯 霖 瑞 趙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
初版發行

基本定價七元

(外埠另加郵運等費)

文藝名著譯叢

嘉思德樂女主持

L'abbesse de Castro

有著作權・不准翻印

著者 Stendhal

譯者 趙瑞霖

發行人 陳汝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南京東海路一八二號
重慶沙坪壩六八號

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

分發行所

漢口交通路
重慶林森路
成都祠堂街

聯營書店

關於斯丹達爾

一

斯丹達爾 (Stendhal) 原來的真實姓名是瑪利，亨利，白爾 (Mari Henri Beyle)。他曾經用過好幾個筆名發表文章，後來在正式出版他第一部著作「羅馬、拿波里。佛羅棱斯」 (Rome, Naples et Florence) 的時候，才決定採取「斯丹達爾」這名兒，有時候，他自己稱為德，斯丹達爾 (De Stendhal) 可惜「德」字之前，並未加上別的稱號，不足以表明貴族的門第和身份，而且根據一些批評家的考證，「斯丹達爾」一字是從德意志布倫慈維克 (Brunswick) 省一個市鎮取來的。那市鎮就叫做斯丹達爾。他於西歷一七八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誕生於法國東南部格雷諾布 (Grenoble)，這地方原是以前叫朵裴納 (Dauphina) 省的首邑，對意大利的交通十分便利。斯氏的父母在當地很有

黠兒名氣，是小康的中產階級。他父親名約瑟，謝呂邦（Joseph Cherupin）爲人奸詐而多疑，管理家事，異常嚴厲；斯氏從少就恨他的父親，時常稱之爲 Mon batur de pars。不過他對於母親，却非常敬愛。她原出意大利望族，上代由於一樁小暗殺事件，逃出國境而定居於法國。當他七歲時，他母親即逝世了。從這時起便開始他自己所謂「道德的生活」（Vie moral）。

斯氏的童年，慘淡寂寞，在一大陣家庭的齟齬中度過。當那熾熱的恐怖時代，他私心極端讚賞共和黨的勝利，尤其對於路易十六（Louis XVI）的死刑，斬於斷頭台之上，覺得快樂極了。他的家族不但是保皇黨，而且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，這形成了他對於宗教的憎惡。他少時跟一位耶穌教士雷耶納（Raillane）唸書，此人虛偽陰險，在斯氏的心目中，不啻是虛詐的化身，也就因此加強了他仇恨宗教的情緒。在別方面說起來，他很敬愛他的外祖父嘉南（Gagnon）和祖姑母伊利莎白。嘉南老先生和藹可親，以醫藥有名於世，是一個信奉伏爾泰（Voltaire）的中產階級人。斯氏母親死後，多承外祖父照拂，他很了解他這個外孫而樂於教養他。斯氏的祖母是一個修長而消瘦的女人，有着

一副西班牙型的美麗容貌，她具有高尚的心腸，稍帶浪漫性格。他認為外祖父是代表十八世紀的哲學觀念，而昶姑母則代表西班牙主義（Espagnolisme）。凡是熟識作者著作的人，一定知道這二方面正是包容着所謂「斯丹達爾精神」（*Peupit Stendalien*）。斯丹達爾精神是一種奇異的組合：這就是十八世紀的文藝的與哲學的氣質，百科全書派的風格與文筆，揉雜着緬懷異國情調和中古時代的遐想。而這兒，我們可以看出斯氏的家庭環境對於他思想與藝術的影響來。

關於斯氏童年的生涯及其家庭情形等等，在他的「亨利，勃魯拉傳」（*La Vie de Henri Brulard*）一書中，有親切而動人的描繪。這部書雖然名為「亨利，勃魯拉」，實際上就是「亨利，白爾」的自傳。作者曾經寫過好幾部自傳，但不是斷章片段，便是寫好了却束之高閣，未曾問世。

當斯氏該入學唸書的時候，他父親送他入一座在格雷諾布新設立的中心學校（*L'école centrale*）求學。在這裏他獲得數學、繪畫及拉丁文的基礎。並且此時他開始閱讀莎士比亞，朗讀不輟，愛不捨手；莎士比亞是他一生最愛崇的一位作家。斯氏在學校中，

以數學一科，博得師長們的重視，但是他心裏却不喜歡它。他一切學問都不是從學校課程上得來的，譬如他對於法國文字又廣泛又淵博的學識，可說都是自己研究的結果。盧梭(J.J.Rousseau)、艾爾維筱(Helvetius)、德拉西(Delancy)、莫里哀(Moliere)、拉芳登(La Fontaine)、亞利歐斯朵(Ariosto)等作家都是他早年所嗜愛的。

一七九九年斯氏到巴黎去，主要的動機是投考陸軍學校(L'ecole polytechnique)。但是他名落孫山。在巴黎耽擱了好幾個禮拜，這離家別親的孩子便病倒了。他在寂寥，煩惱和懷鄉病之中，投奔一位遠親達呂(Daru)家。這是一個活動而顯貴的家族，在拿破崙執政時代極有勢力。當時斯氏的表兄博兒。達呂(Paul Daru)身居顯職，在軍政部做官，便在部裏代斯氏覓得一事，暫時寄居籬下，偷閒潛修。一八〇〇年四月，他決定到意大利去，那時節拿破崙正預備進略意大利；他野心蓬勃追隨達呂家兩位表兄之後，跨過阿爾卑士(Alpes)的崇山峻嶺。一到了意大利，他就發現風光的嫵媚，人情的風雅；他認為這是他的「夢幻之鄉」，「理想之國」。我們不難想像當時他內心的快樂和興奮了。

不久，他得到達呂的幫助，在第六龍驤隊（T. 6^e Régiment）謀得一個差使。但是一八〇〇年秋季他接到命令，要他離開他心愛的米蘭（Milan）到勃萊斯夏（Brascha），到他所隸屬的部隊報到。他不願離開風情旖旎的米蘭一個大原因，是他那時愛上了一位米蘭女人，名叫金娜·彼忒拉格（Gina Pietragu）的。斯氏一生不乏風流戀愛事蹟，這「米蘭之戀」是他第一次的所謂熱情愛（Pamour Passion）。後來，他既厭軍隊生活，又覺得別離的痛苦，便辭掉職務，重回巴黎。他在巴黎淹留四年，潛心攻讀，留情於書卷之間，同時又夢想愛情，追求聲名：曾一度從事劇本的創作，但沒有成功。在這一時期，斯丹達爾才開始走上文藝野心的道路。他熱狂地讀蒙田（Montaigne）、瑪利伏（Molière）、孟德斯鳩（Montesquieu）、古里衷（P.L. Courier）。他尤其醉心於十八世紀哲學的研究：康第拉克（Condillac）、嘉巴尼（Cabanis）、德拉西（Diderot）。其中他最推崇德拉西的觀念論，這對於作者的思想和小說藝術有極大的影響。此外十七世紀的偉大喜劇家莫里哀轟惑了他，使他有與致寫了一個韻文喜劇。他練習台詞，勤於模倣，時常出入於社交界與劇院。

在巴黎住了不久，感於經濟的拮据，他只好到馬賽充一家商業公司的職員。此事却引起他家庭的不滿。同時他又和女伶，梅拉尼·吉爾貝（Melani Curiert）發生一度曖昧關係。到一八〇八年，達呂鑒於親戚交誼，忽視了斯氏以往的少年過失，仍舊薦他做部內的低級職員，嗣後他被調到德國佔領區駐守軍任事，到布倫茲維克，掌理彈藥、稅收、給養等等事務。

一八一二年，他隨着拿破崙侵俄大軍進攻莫斯科，而經歷了那一次驚心動魄的莫斯科之役。當俄人焚毀京城，法蘭西軍隊倉皇敗退的時候，我們的作者，獨立高崗，眺望着熊熊的大火，讚賞這一幕偉大而慘烈的悲劇而嘆道：「唉，這時候，只要跟知心的朋友一塊兒觀賞，我真的心滿意足了！」他懷着顆熱熱辣辣的年輕的心，眼前展開一片寥闊的美麗的光景，他崇拜拿破崙戰爭，夢想燦爛的「紅色」的軍績。他遠別家鄉、深入那「寂寞灰色的國土」，如今他站在高崗上饕餮俄羅斯京都的火化！後來他又眼見法蘭西兵士挨着飢餓，駢着寒冷，疲倦是他們的同伴，死亡是他們的歸宿，在無邊冰天雪地發出無邊的哀號！——這時節的斯丹達爾正像「紅與黑」中的鈺連（Julien），獨立

在維以 (Vetny) 、維鯉葉 (Vortioles) 間的山頭，迎着八月的落日，在山谷靜寧裏，滿耳是山蟲的哀鳴，一隻蒼鷹從斷崖絕壁處飛出來而盤旋在天空中，……鉅連若有所悟不禁嘆息着：

C'est ta destinée de Napoleon; Serait ce un jour lamennes (這是拿破崙的命運，難道有朝一日這也會是我自己的命運嗎？)

這正是斯丹達爾一生中的所謂「英雄時期」(*La Période héroïque de sa Vie 1806-1814*)

斯氏從莫斯科回來後，拿破崙很賞識他，任命他為國會的審計官 (*auditeur*)，隨後不久他又做過一任空名的。但頗有利可圖的官。這官名叫 *Inspecteur du Nobilier de la Couronne*。(九一三年，他隨軍入奧大利，並在沙襲、Sagon 任監督 (*Intendant*) 之職，到一八一四年他被調至他的故鄉格雷諾布，完成了一件極有價值的工作，這就是組織了朵裴納的保衛軍。可是他身體多病，時常疲乏，使他不得不回巴黎。但是當拿破崙駕臨厄爾巴時 (*erba*) 時，他又離開故鄉到意大利去了。他在米蘭整整住了七年，經

常和文士名流來往；金娜·彼忒拉格成爲他公開的情婦了。

此時他官場活動已經得到滿足，他已養成一種明快熱烈的作風，他常是生活在歡樂裏。他善於觀察人們的容貌，分析人們的性格，刺穿人生虛偽面具。同時，他特異的性格也逐漸形成了；他非常驕矜，態度時冷時熱，隨處都顯出一種「自我」(Moi)的精神；他喜歡批評攻擊人們，尤其當公共議會場所，他一邊談笑自若，風趣橫生；一邊揶揄旁人，毫無顧忌，不免引起人家的討厭。因此在社交界裏，斯丹達爾被認爲一個奇怪的，不易討人喜歡的人物；他底作品正如他的性格，是奇特的，叫人不容易了解的。所以他自己說：Je saurai compréhens 1830, (我到一八八〇年會爲人所了解的。)這句話可以用在他的作品和他的性格上。

他歷年的奔波，以及戰後的疲勞，使他的健康漸漸損壞了。並且這時他對於拿破崙的事業已發生懷疑，由崇拜拿破崙一變爲憎惡拿破崙了。於是他只好告假引退駐足歌馬(Corbière)湖畔。不久，不可一世的拿破崙的御座粉碎了，偉大的帝國化成一縷硝煙，幾星殘火，斯丹達爾留連於寂寥的厄爾巴島上，埋葬了他的希冀，他那一時代的希冀；而他那

熾熱的夢幻和榮華的追求隨之烟消雲散了。

然而，這時候他已成為一位作家了。在一八一四年已經出版一本關於海登（*Lettrés écrits de Vienne en suédois Aur Haydn*）和莫札特（*Mozart*）的書。他在意大利尋幽探蹟，沉緬於意大利的人情風尚，而盡量滿足他對於意大利藝術的好奇心和熱情。一八一七年出版兩部著作：「羅馬、拿波里、佛羅稜斯」和「意大利繪畫史」（*L'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*）。前者是一部遊記，他用流利的文字描繪意大利三大名都，處處有動人的摹寫。我們知道，斯丹達爾不但是大小說家，還是個遊記家。他一生寫下好幾部不朽的遊記。他底遊記就彷彿他底小說，有一特色：不注重風景的描寫，而注重風尚的刻畫，地方色彩的捉摸和人物性格的雕繪。假如我們要談他的遊記，那末他的「三遊記」便是最佳的代表作。

一八一九年他的父親逝世了，死後身世蕭條，他縻念的一筆遺產付諸東流。他原想依靠遺產過一種優游閒適的作家生活的，現在只好獨力奮鬥。支持他的家庭。此時斯氏頻發狂論，喜作奇癖的，有破壞性質的言談，引起了意大利祕密警察的注意，所以在—

八二一年他在意大利便待不住了，他只得回巴黎。同年秋天他到英國作了一次短短的遊訪，和一個文藝雜誌編輯高爾朋（Colburn）訂交。他開始撰寫許多關於巴黎生活和文藝的文章，就在高氏主編的雜誌上發表。同時由於職業關係，不得不時常赴政治的文藝的「沙龍」（Salon）而相識許多人物。這是他生平最活躍的，也最光彩的文學生涯的一階級。他寫下了「愛情論」（De l'Amour），「拉辛與莎士比亞」（Racine et Shakespeare），「樂西尼傳」（Vie de Rossini），「亞曼西」（Armance），「羅馬散步線」（Promenades dans Rome）。

到了一八三〇年，他完成偉大的傑作「紅與黑」（Le Rouge et le Noir）。翌年，「紅與黑」便出版了。一八三一這一年，在世界文學史上是重要的，正如一八五七年也是重要的一年。因為前者是近代第一部心理小說巨著「紅與黑」問世的年份，它在世界心理小說發展的道路上樹立了一塊劃時代的里程碑，也可以說是一個承前啓後的偉大的日子。後者是福洛貝爾的第一部名著「波娃利夫人」（Madame Bovary）誕生年。

而「波娃利夫人」在現實主義小說發展的歷史上是一部傑作，一部空前的代表作。

每逢我們一提及文學上的現實主義（Realisme），我們便想到福絡貝爾底「波娃利夫人」：競彷彿當我們談論心理分析的小說時，立刻會在眼前浮現「紅與黑」三個輝煌的大字。但是不幸的是，「波娃利夫人」一出版馬上引起人們空前的注目，紛紛議論，一方面是同情的讚頌，一方面是嚴酷的責罵，「波娃利夫人」被傳上了法庭，我們可以想像福絡貝爾先生怎樣緊張的待在賽納河上游克窪塞（Clamart）的小樓上關懷它命運的浮沉。但是，我們底「紅與黑」却在寂寞冷落中度其閑靜的日子，髮髻一顆珍貴的寶石埋葬在地底，未經「幸福」的人們掘發而賞識。當時人們沉落在熱狂的浪漫主義的怒潮中，為一時的風尚所激盪。特別是一般年輕人，追隨雨果，高擎着五色繽紛的大纛，真摯而慷慨，到處是「愛納尼」（Hernani）的吶喊，「巴黎聖母院」（Notre Dame de Paris）崔巍的影子，跟柔和如天青色的虞賽的情歌……斯丹達爾，一個忠實而「笨拙」的筆耕者，在寂靜中獨自經營他所珍惜的田地。他不求人了解，也不為人所了解，連他的莫逆之交，「歌龍芭」和「嘉爾曼」作者梅禮美最初也不懂得他。有一次梅氏嘆道：「嘿，白爾，我就不曉得他寫過些什麼東西，旅行過些什麼地方……」。而現實主義大師福絡

賈爾說他自壓根兒不了解「紅與黑」的人物和旨趣。斯丹達爾頗有自知之明，在「紅與黑」的扉頁上寫了 TO THE HAPPY FEW (獻給幸福的少數人) 這四個英文字眼兒！他挾着四十多萬字的「紅與黑」原稿本，走過熙熙攘攘鑼鼓喧天的街頭，覺得格外的寂寞，可是他却非常驕傲，他要五十年之後，尋找他的讀者。

在「紅與黑」問世之後，斯氏的生活起了一個變化，因為一八一三年七月，史家所謂「光榮的時代」來臨了，時間爲他製造一個新的命運，他被任命爲意大利楚利耶斯忒 (Trieste) 城的領事。可是不久又被調任西維坦，維幾亞 (Civita Vecchia) 城。這地方雖然離羅馬不遠，風景幽美，但是依斯氏看來，是個貶逐之區。爲了打發日子，驅除煩囑，他用心辦理公事，研究考古學，收集中古時代意大利的金碧輝煌的抄本。後來，於一八三六年，得到他朋友莫爾 (Mole) 的幫助，託病請假而返巴黎，一刊滯留到一八三九年秋天。在這一段時日內，他寫了「一個旅人的回憶錄」(Mémoires d'un Touriste)——這是記述他游歷法國各地的履痕：在這書的字裏行間，有點受着梅禮美考古癖的影響——「南國之旅」(He Leyage dans le Midi)。和他底第一部傑作「芭穆外史」

(La Chanteuse de Parme)。「芭穆外史」底出版，却立刻獵取了一部份讀者的注意；大家對他的態度也不像當年「紅與黑」誕生時那樣冷落了。一八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巴爾扎克在巴黎評論(La Revue de Paris)上發表了一篇熱烈的文章來頌揚他的「芭穆外史」，但是他看了之後，只報以不快的微笑！

「芭穆外史」是斯氏在世最後一部出版的大著。這書之後，他又着手寫一部自傳體的小說「露西森：樂瑟」(Lucien Leuwen)。可惜此書斯氏無福完成。斯丹達爾走過一條幽暗的道路，身體漸漸不支，患了中風的毛病。然而他還努力寫作，不肯休息，在去世之前，有還創作了不少傳奇式的中短篇小說。這類小說泰半取材料於意大利中世紀以來的軼聞、故事、傳說，加以斯氏特異的技巧，宣染的手法，高明的安排，一一化成了優秀的藝術品。它們後來輯錄成書，通稱為「意大利歷史故事集」(Les Chroniques Hatiennes)，其中以「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」(L'abbessa de Castro)一篇為最著名。

一八四一年十月，斯氏奉命辦理要公，抱病從意大利跑到巴黎。翌年三月初，舊疾復發，一陣突然而來的癱瘓使他跌倒街心，別人送他回家，他一直昏迷不醒，藥石罔靈